

从柏林 到耶路撒冷

(以) 格舒姆·索罗姆 著

Von
Berlin
nach
Jerusalem

漓江出版社

从柏林 到耶路撒冷

(以) 格舒姆·索罗姆 著

吴勇立 译

林草何 校

Von
Berlin
nach
Jerusalem

漓江出版社
桂林

Gershom Scholem, *Von Berlin nach Jerusalem. Jugenderinnerungen*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7.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2015 Lijiang Publishing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2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柏林到耶路撒冷/(以)格舒姆·索罗姆著;吴勇立译;林草何校.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1

(子午线译丛. 第2辑)

书名原文: Von Berlin nach Jerusalem. Jugenderinnerungen

ISBN 978-7-5407-7689-3

I. ①从… II. ①索… ②吴… ③林… III. ①索罗姆-回忆录 IV. ①K833.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2479号

责任编辑:吴晓妮 叶 子

装帧设计:居 居

特约审校:孙增霖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插页:4 印张:6.625 字数:10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录

1	出身和童年(1897—1910)
22	犹太环境
38	犹太意识的觉醒(1911—1914)
64	在柏林的大学生涯(1915—1916)
90	施特鲁克公寓(1917)
103	耶拿(1917—1918)
115	伯尔尼(1918—1919)
126	慕尼黑(1919—1922)
155	重返柏林和法兰克福(1922—1923)
177	耶路撒冷(1923—1925)
193	参考书目
195	附录:《从柏林到耶路撒冷》“索隐” 张亮

出身和童年(1897—1910)

自我有幸在耶路撒冷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获得一席教职时起,我就开始记录自己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1925年的片段回忆。我自然知道,描述在柏林度过的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并不鲜见,尽管我自己并未读过。我的情况特殊在,我要说的是一个犹太青年的成长之路,这条路从青少年时代的柏林通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在我看来这条路特别直接,而且配备了清清楚楚的标志,但我不得不说,在其他人看来(包括我自己的家人),我选择这条路是无法理喻的,甚至是令他们火冒三丈的。

我来自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下西里西亚的格洛高(即大格洛高),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陆陆续续地迁往柏林。“索罗姆”这个姓氏,在阿什喀纳斯地区的犹太人那里本来是很普遍的常用名字——希伯来语单词“Schalom”(“平安”之意)在阿什喀纳斯地区的方言里就读作“Scholem”,但用作姓氏是相当罕见的。迄今为止

我碰到过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姓氏为“索罗姆”的家庭一共只有三个,一个来自上西里西亚,一个来自巴登的圣因贝特,还有一个来自凯泽斯劳滕的诺伊施达特,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¹就曾在那里做过几年家庭教师。1812年普鲁士的犹太敕令(Judenedikt)²特别规定,为了便于有序地管理户籍,避免在一代代人的传承过程中频繁地改换姓氏,所有的犹太人必须选用固定的姓氏。当时市政府传唤我的高祖父,问他姓什么,他没有明白其意就回答说“索罗姆”,那位官员就把这个词当作姓氏登录在册了。然后那位官员接着问我的高祖父他的名字是什么,高祖父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索罗姆”。于是我们家的姓氏就成了“索罗姆”。在别的文件中我们发现他的名字叫作索罗姆·艾利亚斯(Scholem Elias),意思是“艾利亚斯的儿子索罗姆”。在我童年住处的会客厅里挂着高祖母齐波拉·索罗姆(Zipporah Scholem)的油画肖像,这幅肖像画作于1821年或1831年,跟我现在所熟悉的索罗姆家族的人已经非常相像了。现在这幅画悬挂在悉尼的我的长兄家里。据说,此画是一位参加了德意志解放战争的亲戚在格洛高绘制的,高祖母正襟危坐的仪态完全符合一位犹太女性家长应有的风范。在我们的“柏林居室”——也就是当时中产阶级公寓的过道上的

1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年8月26日—1918年11月9日),法国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先驱之一。(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1812年3月11日普鲁士政府专门下达的这道敕令使得生活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国家公民身份。该敕令保证了犹太人在法律上拥有和德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从此以后,普鲁士犹太人不再被视作外邦人,在国家法的层面上不再被规定为下等人,但是该敕令仍保留了敏感的限定性条文,而且也不是在普鲁士全境有效。

大房间,通常用作餐室——挂着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照片,旁边是我母亲和她众多闺蜜的合影,下面的题字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古怪:“以色列处女协会 1888 年于夏洛滕堡”。在当时没人笑话这样的落款。这些年轻女子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我母亲后来的朋友圈。最后一位处女在 90 年代初结了婚,该协会就以自然的方式解散了。

1897 年底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出生地是腓特烈运河边上的柏林老城区,现如今再也看不见炸毁的房屋,而只是一片散布着草丛和长椅的公共绿地。我的曾祖父参加完解放战争之后不久就迁居于此,1845 年去世。从此我们家三代人居住在柏林。

我们这个家庭走过了一条生活方式大转换之路:放弃了西里西亚犹太人和波兹南犹太人——这两类人构成了柏林地区犹太人的绝大多数——的正统犹太生活方式,差不多全盘接受了与当地环境同化的生活方式。在 18 世纪,格洛高是西里西亚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区,我其他的父辈分支的先祖都是来自小城市,比如奥德河畔的布埃滕、奥拉斯和柯布恩。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前文提及的 1812 年犹太敕令颁布之前,都不允许在波兰被瓜分前属于普鲁士各省的犹太人居住在布雷斯劳这座城市。1812 年的敕令赋予了犹太人一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由迁徙的决定权。只有个别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过所谓大恩典的富足家庭(当然还包括数量相当可观的犹太“仆役”)是例外,这些家庭都在腓特烈大帝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中

发挥过重大作用,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的积极主动为普鲁士当局所喜见,并且获得了后者的支持。大量的犹太人住在乡野和小城镇,他们的后人有很大一部分从那里出来,涌进了布雷斯劳和柏林。我母亲的先祖是赫尔施和普夫劳姆家族,他们来自一个叫作雷兹的弹丸之地的两个犹太社区,雷兹属于波兹南省,位于“诺伊尔马克”¹东北角的最外沿,那两个犹太社区分别叫作拉维迟和里萨。我从没有听母亲说起过“波兹南省”,只听她时常说到“大公国”。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特别法,直到1847—1848年,也就是她父母年轻的时候,在拿破仑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沙公国”的治下,只要犹太人生活在维也纳议会上通过的归还普鲁士的土地上,他们就必须遵守这些特别法。我的父母及其素有来往的亲属、姻亲家庭,来历莫不如此。我父亲的祖母——姓名从艾斯特·霍兰德变成了俄内斯蒂娜·索罗姆——在她丈夫早早地故去之后,在柏林旧城区的修道院大街,也就是离格劳恩修道院高级中学不远的那条街上,开了一家犹太餐馆,当时的人们管它叫“恪守教规的小饭馆”。一谈起这样的往事,我父亲就总是说,他兄弟的岳父们年轻时从波兹南和西里西亚跋涉到此之后,全都光顾过他祖母的小饭馆。于是联姻家庭就这样产生了,与我外祖父母家的亲密友谊尤其要归功于小饭馆。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去过祖母曾经生活过并在那里做过饭的房子。关于

1 诺伊尔马克(Neumark):奥德河东岸的历史名城,今属波兰,并非位于今德国图林根魏玛县、距离埃尔福特仅20公里的市镇。

遵守教规的经营之道我们现在一无所知。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一位很晚才结婚的叔祖带着他三个没有出嫁的女儿经营着一家严格遵守教规的餐馆,一直到离世。1910年在他八十大寿那天,我才向他打听到我们祖上的事迹。

从1861年到1938年,我的父系家族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在柏林开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增开了一家。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祖父当年学徒期满的试件,他在很多家印刷厂接受了长期的学徒和帮工培训。该试件印制于1858年,那是托马斯·曼的一位同乡、今天已经完全被人遗忘的弗里德里希·海姆茨逊·欣策(Friedrich Heimbartsohn Hinze)的《诗集》,1859年出版。

我叔叔还保存着当年祖父排版印制的一本犹太祷告书。祖父1833年出生于柏林,先是在曾祖父母那里,后来在犹太社区的孤儿院受过严格的犹太式教育,他个人就代表了犹太人向德意志文明的转变。他仿照当时犹太家庭普遍遵守的习俗,在自己的姓氏里加上他已故的祖父的名字,也就是索罗姆·索罗姆。户籍登记处的官员拒绝在出生证明上记录这个名字——该证明的原件我还保留着,经过费尽唇舌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一致,采用所谓的德国化的形式:索尔姆(Solm)。从未有人采用过这个姓氏。祖父50岁的时候还是狂热的瓦格纳拥趸,从那时起他给自己定名为齐格弗里德·索罗姆,他的印刷厂就是用这个名字登记在商业登记册中。他葬在了柏林维森湖区的公墓里,墓碑上用希伯来文镌刻的姓氏还是“索罗姆·索罗姆”,但墓碑正

面的德文则用了“齐格弗里德”的名字。而我父亲的墓碑（1925 年下葬）上已经没有了希伯来语。

父亲阿图尔出生于 1863 年，同样在柏林稍大一些的印刷厂接受过长期的学徒和帮工训练，80 年代初期甚至在伦敦干过一年的排版工。我们家族的一支在 1860 年前后迁居伦敦，直到我的童年时代，家族跟他们都保持着联系。1883 年，年轻的索罗姆带着一副飘逸的大胡子回到柏林，这种样式的胡子后来被威廉皇帝式的向上翻翘的髭须取而代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每个星期天都去格尔特劳德大桥边上的咖啡馆，在那里他要读两个小时的《曼彻斯特卫报》，这份报纸对他的世界观产生的影响至少不在我们家一直订阅的《柏林日报》之下。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就进了祖父的印刷厂，为了该厂的扩张他没少费力。父亲和祖父都是易怒暴躁的脾气，除此之外两人没有一点共性，彼此关系很不融洽。父亲结婚（1890 年）之后不久，从 1892 年起就独立创业，一开始面临的问题还小一些，到后来麻烦就越来越大。他刚过 40 岁就得了心脏病，每年都要去瑙海姆温泉接受时间不短的疗养。我的母亲最初是管记账的，也拥有代理权，那段时期就接管了厂子。所以在我成长的那几年，就必须照顾到父亲的心脏病，避免一切刺激他的可能性。于是，他跟我们孩子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特别紧密。父亲从他在行业组织和制版业健康保险计划中的活动里得到了满足感，在超过 25 年的时间里，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和

精力投给了后者。他身材矮小而敦实,眼睛近视,四十岁就秃顶,这些特征都遗传给了我们。

母亲也只有中等身材,而我的接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得自于赫尔施家族先祖的遗传。她同样来自柏林,童年的很多时光是在小城市度过的,比如离哈尔茨不远的塞森、西里西亚的列奥舒茨,外公曾在那里的两个犹太人机构里做过养老院院长和孤儿院院长。后来他带着一家人迁回柏林,重新拾起商人的职业。他还保持着鲜活的犹太兴趣,19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和别人一起在他居住地所在的夏洛滕堡的克鲁姆大街上兴建了一座自由的犹太小教堂。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安葬在那里,他们去世时我分别只有三岁和六岁。对这两位老人我只有相貌上的记忆,而对于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直到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每隔两周就看望她们一次,所以对她们二老有准确的记忆。她们俩在我记忆中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老得不能再老。祖母阿玛利亚·索罗姆住得离我们很近,拥有性格刚毅果决的名声。祖父生前相貌英俊,但性格软弱,所以祖母在家里和生意场上都是绝对的统治者。直到临终她都节俭得无以复加。每次去看望她时,我们都一再地被嘱咐,她给的糖果绝不能拿,因为她四个儿子在看望她的时候带来的糖果,她总是习惯于把它们存放起来,直到它们发霉长毛了为止。我很小的时候是个爱吃甜食的“小馋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看着一半发霉了的巧克力果仁糖的失望心情。离别的时候她总是送给我们五芬尼,有时甚至十芬尼作为安慰,拿

到这些零钱,我马上就到她住所对面的巧克力商店非常内行地去消费,要么是两块华夫饼夹一份冰激凌,要么是巧克力罂粟籽小饼干。母亲常常告诉我,她婆婆最希望有一个孙女,用她已故母亲的名字菲利宾娜来命名。生下的第四个孩子就是我,让祖母的期望严重落空,这位做婆婆的愤愤不平,几个月不和我母亲说一句话。在祖母的房间里放了一台带有钟摆的奇妙的大座钟,后来归了我叔父泰奥巴尔德。这座钟本是她父亲大卫·施莱辛格于1810年在钟表铺完成的满师考试的试件,每隔一刻钟敲打一声,当时极度受人尊重。今天它还在我堂妹狄娜位于海法附近的蒂温的家里服役。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有数量众多的兄弟姐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柏林。我母亲的一个舅舅还是蒙受腓特烈三世王恩的宫廷摄影师,他的好几个儿子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最丰富的分支。我母亲和她的这些表兄弟姐妹们的关系非常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而我父亲对这些亲戚相当张扬外露的举止行为则表现出一定的保留态度,他很不愿意陪母亲去拜访他们。在我这一辈人当中有一位表妹生就了沉鱼落雁的容貌,她的名字叫马尔戈特·普夫劳姆,他们是那个家族中我们唯一欣赏的人。

总的来说,我们的家庭圈子属于犹太市民的中下层,这个阶层从很小很小的开端起步向上奋斗,到上个世纪中叶达到小康程度的人已不在少数,虽然达到真正富裕的还比较少,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跟犹太人来往。那个时候,泰

奇克(Teitschke)针对来自波兹南省、像潮水一般涌入柏林去做裤子生意的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说过很讽刺的话,令他们名誉扫地;这些话同样适用于那些我所认识的在其晚年成为浴缸厂和肠衣厂厂主的人,他们都很有钱。我的几位姨母就是来自这些家庭。在我父母这一辈人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转向了学术的门庭。我最小的叔叔先前就读高级中学,并且在经济条件非常拮据的状况下进大学学医。我父亲的另一个兄弟对人类文化学和东方怀有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可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去接手祖父的生意——在祖父的经营下,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另一方面,我母亲的两个弟弟妹妹却能够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读大学,我姨母是柏林最早的女医生之一,舅舅后来成了化学家和处理专利问题的律师。我父亲这边成为柏林众所周知人物的只有一位亲戚,他就是在该市的戏剧史上留下了赫赫声名的菲利克斯·霍兰德(Felix Holländer),马克斯·莱茵哈德¹的戏剧顾问,费舍尔出版社的小说作者。可是我们与这两位亲戚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保持联系。

我父亲和他的两位兄弟在青少年时代非常积极地参与柏林的体操协会活动,该协会是最具小资产阶级特征的组织,一直到80年代都保留着极其自由的风格,但是从1890年开始越来越表现出反犹的倾向。我父母的书架上有一本小书,书名叫《德国体操知识大全》,是父亲于1887年出版

1 马克斯·莱茵哈德(Max Reinhardt, 1873—1943):奥地利戏剧和电影导演,剧院经理。

的。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如当时的人们所说,在向德国归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在我们家里能感受到的犹太遗迹非常少,比如犹太人的惯用语,我父亲是避而不用的,也不让我们说,可是母亲却非常爱说,尤其是在她想要加强语气的时候。比如她想表达某件事情毫无意义的时候,她就肯定会使用外祖母从拉维迟带到柏林来的说法:“Hat sich die Kose bemeikelt”,意思是,“山羊拉的一坨屎”。我的一位叔父在体操协会长期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下,成了最早的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每逢家庭聚会,为了表达对我父亲的不满,也喜欢使用这类粗口以表示强烈的挑衅。在表达令人怜爱的词汇中,感情色彩尤为强烈的一个词是 *nebbich*,最终我把它吸纳到了我自己的语库中。有一次我陪着母亲去拜访她的表姊妹,这位名叫格雷特·博夏特的姨母这样说我:“小盖尔哈德真是体面得惹人怜爱(*nebbich*)。”这样的话语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在犹太人的习俗方面,我们只保留了作为家庭节日的星期五家宴和逾越节家宴两项,索罗姆家的全体成员以祖母为中心,后来就以我父亲为中心,或者轮流选一位叔伯作为中心人物团聚一堂。在聚会上要诵唱 *Kiddusch*,希伯来语“安息日祷告”的意思,但是大家只理解一半的内容,而这并不妨碍大家事后用安息日烛光点燃一根香烟或雪茄。安息日禁止抽烟是犹太教最为著名的一条禁令,这种举动无疑

是有意识的嘲弄。每逢逾越周,分别装着面包和马茨饼¹的两个小篮子并排放在一起,涂抹了蜂蜜的马茨饼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最具犹太性的节日是赎罪日(Yom Kippur),绝大多数人都还将之当作斋戒日来遵守,而我父亲则照常上班,根本谈不上斋戒。母亲和她家族的人还严格遵守斋戒的要求进犹太教堂,至少我的两位舅妈还保持着斋戒的戒律,并且进犹太教堂。不怀好意的人会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事情,一家著名的餐馆——就是欧朗尼安布格大街的犹太大教堂旁边,与炮兵大街街角相交处的餐馆——门前站着一名服务员,向穿着节日服装的客人打招呼:“尊贵的斋戒客人,请您去后面的房间用餐。”另一方面,我父亲还保持了这样的习惯,即每年一两次在午饭桌前作一番歌颂犹太教使命的宣讲,讲话的内容大体就是我们要为了这个世界保持纯粹的一神教,并且传布一种纯粹的、合乎理性的道德。洗礼在他看来是一种没有原则性的奴性行为。柏林的犹太社区有一份专门的报纸,免费赠予该社区的所有成员。从1910年开始,根据社区的有效法规,把退出犹太教的那些人的姓名通报给地方法院,以便让这些人能够免除缴纳社区税款的义务。报纸总是在最后一版上刊登这类消息,该栏目的内容往往是整份报纸上最能吸引人们饶有兴味去阅读的部分。我还记得好几起这样的案例:被公开姓名的人极度不安,他们徒劳地尝试阻止该报纸将

1 马茨饼: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未发酵的面包。

他们的叛教行为公之于众。

我的父母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学过阅读希伯来语。母亲看似把早年学过的这项技能忘了,却在我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并走进犹太教堂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当我带着优越感谈及她犹太知识的匮乏,出于对我的评论的回应,她凭记忆把犹太教祷文里最重要的文本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那段文字是《申命记》里的 *Schma Jisrael*¹,虽然她并不知道其含义是什么。按照犹太人的礼俗,这段经文是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外公教会她的,那是晚上睡觉前的一段祷告经文,几乎五十年之后母亲还记忆犹新。

我9岁那年,也就是1906年,全家搬到了离旧居腓特烈运河边仅两三分钟路程的更大的居室,也就是新格伦大街26号。我们的住所直接面对着“圣彼得教堂社区”的正大门,教堂坐落在一间很大的花园内。这条街上的大部分房屋后来都被炸毁,不过1946年我还能看到教堂的正大门连同其老旧的牌子。教堂的旁边紧邻着奥托·冯·霍尔屯印刷厂房,门面气派,牌匾雅致,当年施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s)的作品及其同仁编创的《艺术之页》(*Blätter für die Kunst*)都是在这里印制的。我在1913年和1914年第一次接触了施蒂芬·格奥尔格的诗,有几首至今印象深刻,因此看到这座房子的时候兴趣就特别浓厚。有一次我在莫

1 希伯来语,意为:“以色列啊,你要听!”犹太人的祷告词。

伦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从著名的格塞留斯旧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第一版公开刊行的《灵魂的年月》(*Das Jahr der Seele*),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书名的缘故,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于是买了一本。这是我第一次读格奥尔格的诗,此后我又买了这位诗人的多部诗集,包括1914年初刚刚出版的《同盟之星》(*Stern des Bundes*)。八年后我再读此书,还是被激怒了,尽管诗集中有几篇作品非常精彩¹。我把这本书从藏书架上拿下送给了我的表兄弟海因茨·普夫劳姆,他对格奥尔格圈子很有兴趣。不过《灵魂的年月》《生命之毯》和《第七个环》里的不少名篇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新的住处,我几乎度过了我全部的柏林岁月,当然我不能在和哥哥们玩以前的游戏:把樱桃核越过乌弗街吐进施普雷河。除此之外,这次乔迁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没有带来其他的大变化。我就读的学校没有变,还是位于塞巴斯蒂安大街上的那所路易森施达特文理中学,我在那所学校连续九年坚持每周学习四个课时的拉丁文。想要玩耍的时候我就去不远的麦凯什公园——麦凯什博物馆就在那里落成——跟原本不认识的同龄孩子玩弹子游戏。公园对面的因瑟尔大街上有一个给木材公司或煤炭公司堆放货物的广场,四周用木板做成篱笆围成一圈,通常有不少粉笔字写在

1 格奥尔格的这部诗集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反犹倾向。至于格奥尔格何以持有这种倾向,原因比较复杂,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格奥尔格本人非常蔑视新教,而善于经商的犹太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唯利是图因子与新教伦理一拍即合,尤其是在柏林这样一个集合了各色人等的大都会里,汇聚了太多的犹太商人和妓女,令格奥尔格分外反感。